

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出土陶鼓研究 *

秦小丽

内容提要 新石器时代陶鼓多见于仰韶文化时期,而礼仪制度理应完善的龙山文化时期反而少见陶鼓的出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作为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大型村落遗址,在近期的资料整理中发现了三件以上的陶鼓,但其形状与陶寺墓葬发现的大型鼉鼓相比小且呈罐形,似乎是一种来源于日常生活的陶鼓形器。本文从这一新发现出发,对龙山文化时期陶鼓的社会意义和在中华礼制文化中的意义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客省庄文化 康家遗址 陶鼓 礼仪文化 宴饮祭祀

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25.02.001

陶鼓作为史前时期乐器的一种,在仰韶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多有发现,且分布范围也较广,在东北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全域、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均有发现^{〔1〕},分别属于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不同考古学文化。陶鼓大多出土于墓葬中,极少量出土于房址和祭祀性遗迹等,仰韶文化时期是陶鼓流行的高峰。进入龙山文化之后,最为著名就是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大型贵族墓葬发现的陶鼓和漆木鼓^{〔2〕}。陶寺墓地陶鼓的发现,促使学术界开始认识与关注陶鼓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与出土状况。但是就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龙山文化时期除了陶寺遗址出土的6件陶鼓外,仅在山西吉县西村穆家咀遗址发现1件^{〔3〕},其他地区目前还未见有相关发掘的报道。因此看来,新石器时代陶鼓在仰韶文化时期达到流行高峰之后,于龙山文化时期似乎并未流行,甚至走向了衰退。然而近期在对陕西临潼康家客省庄文化遗址出土资料的整理中,发现了3件以上的陶鼓,同时本文即将完成之际,在西安蓝田杨家沟客省庄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2件陶鼓。这在龙山文化时期是比较少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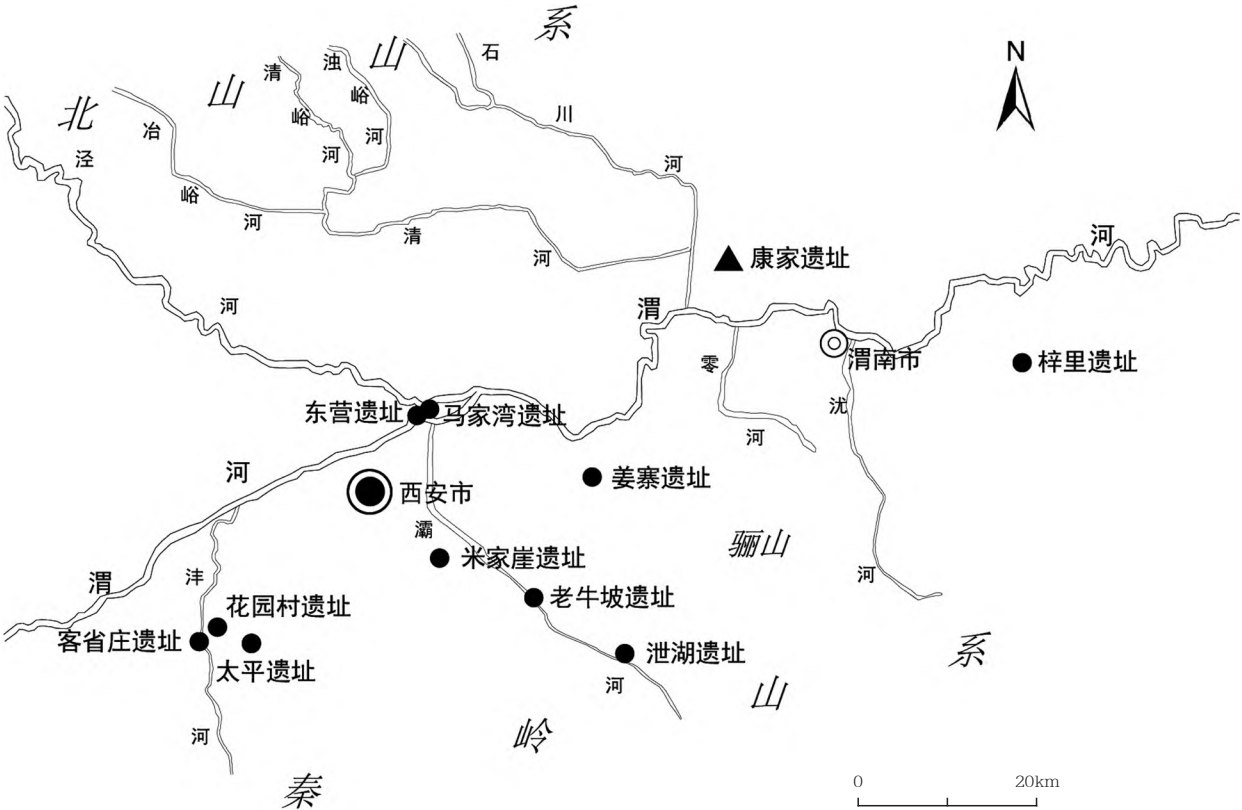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支持项目“鸡叫城遗址资料整理与价值阐释”(项目编号:23&ZD269)研究成果之一。

〔1〕 费玲伢《新石器时代陶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第295—319页;费玲伢《淮河流域史前陶鼓的研究》,《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第48—60页。

〔2〕 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25—140页;刘慧《新石器时代陶鼓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3〕 前揭刘慧《新石器时代陶鼓研究》。

〔图一〕康家遗址地理位置图



一 临潼康家遗址新发现的陶鼓

最近在整理陕西临潼康家遗址考古资料过程中，于1985和1987年两年度发掘区域出土的陶片中相继发现了3件小型陶鼓个体和3片陶鼓残片，为较少发现陶鼓的龙山文化晚期增加了新的资料^{〔1〕}。

位于黄河支流渭河北岸的陕西临潼康家遗址，是一处单纯而典型的客省庄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遗址，其所在的渭河北岸，自然环境优越，河流环绕，西距石川河约4公里，南距渭河4.5公里，与著名的骊山直线距离仅约20公里〔图一〕。

康家遗址自1973年被发现以来，共历经四次试掘和四次发掘，遗址现存范围东西约420米，南北约460米，在大约193,000余平方米的遗址内，试掘及正式发掘共计揭露面积2500余平方米，发现了客省庄文化时期的房址300余座、灰坑280余座、少数陶窑和20余座灰坑葬等遗迹，出土陶、玉、石、骨蚌器等各类遗物数千件^{〔2〕}。在1985年发掘时，发掘者以排水沟为界将遗址区分为四个区域^{〔3〕}，排水沟以南编为I

〔1〕 秦小丽、蒋成成《临潼康家遗址资料整理的新进展》，待刊。其中陶鼓资料为首次刊发。

〔2〕 前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陕西临潼康家遗址考古报告》(项目编号19AKG002)结项报告，2024年9月提交。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刊，第214—228页。

区,排水沟以北的东南部为II区,东北部为III区,1990年发掘的IV区在1988—1989年发掘区的西边一百余米处〔图二〕。其中1985年的发掘在I区,1987年和1988—1989年两次正式发掘则均集中于遗址东南部的III、IV区。经发掘确认整体聚落由成排成行、上下多层叠压的联排式房址组成。根据20世纪90年代碳—14测年(木炭样本),康家遗址的绝对年代为BC2215—1900年,属于龙山文化晚期^{〔1〕}。这次整理中发现的陶鼓均出土于灰坑,3件均仅残存鼓身的上半部分,在口缘部都有围绕一周鹰喙状突起的鼓钉,其他3件残片则仅口缘部有鼓钉的残留。首先介绍3件可复原陶鼓的具体状况〔图三〕。

87KKT5H35:1:口径12厘米,残高11.5厘米,泥质灰陶,器表打磨光亮,口缘下2厘米处围绕着一圈鹰喙状突起的鼓钉,鼓钉间隔2厘米,仅残留8个,按照间隔复原,应该有33个鼓钉。鼓钉长约10厘米,鼓钉下方1厘米处有一道磨痕。距离口径7.5厘米的腹部有钻孔2个,对称分布在鼓腹部的两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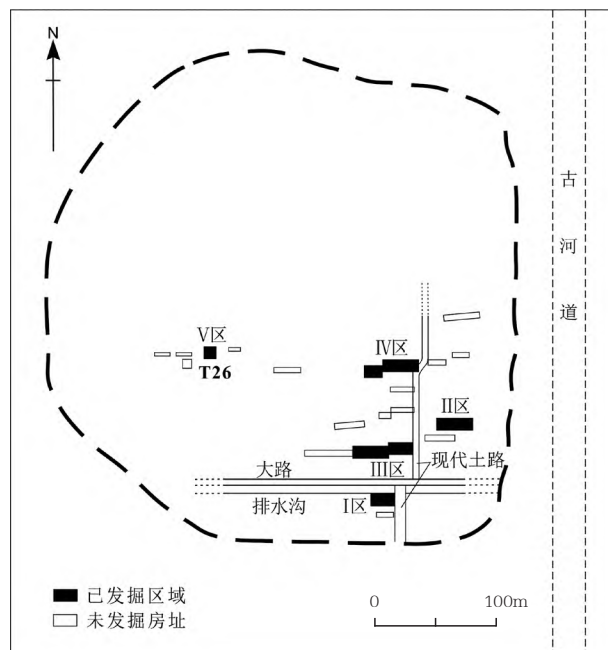
85KKT1H6:12:口径12厘米,残高4.6厘米,泥质灰陶,器表打磨光亮,口缘下有一周鹰喙状突起的鼓钉,仅残留8个,鼓钉长1.1厘米,鼓钉间距2厘米,按照间隔复原,原本应有23个鼓钉,因陶鼓下腹部残,未见对称钻孔。

85KKT1H6:13:口径11厘米,残高5.6厘米,泥质灰陶,口缘下有一周鹰喙状突起鼓钉,鼓钉间隔2.5厘米,复原应有13个鼓钉,口缘部与鼓钉之间有2个钻孔对称分布在鼓的两侧。此外,同在85KKT1H6内还发现3个陶鼓的残片,均为泥质灰陶,仅残留口缘部,分别带有1到2个鼓钉,从其形状与质地来看,应该分属于三个不同个体,其他信息不明。

何德亮曾撰文认为^{〔2〕},陶鼓的陶胎一般比其他器物厚,在口沿下通常有一周用来冒革的凸钮,这些凸钮是用来固定鼓皮的,腹部和器底有大小不同的孔作为出音孔。目前考古出土的陶鼓在口沿处都有泥塑的突起、革丁或者鹰嘴钮,这是陶鼓曾经蒙革的证据。而从音乐学角度出发,敲击陶鼓想要发出浑厚的声音,鼓腔必须上下贯通,或者鼓身有出音孔,这是区别陶鼓与其他实用器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上界定是否陶鼓的依据显示,康家遗址出土可复原的3件陶鼓形器具备用于打击乐的陶鼓特征。

康家遗址出土的陶鼓不仅形态较小,而且器形也与一般陶罐形态相似,暗示着其源于生活的影子。

〔图二〕康家遗址历次发掘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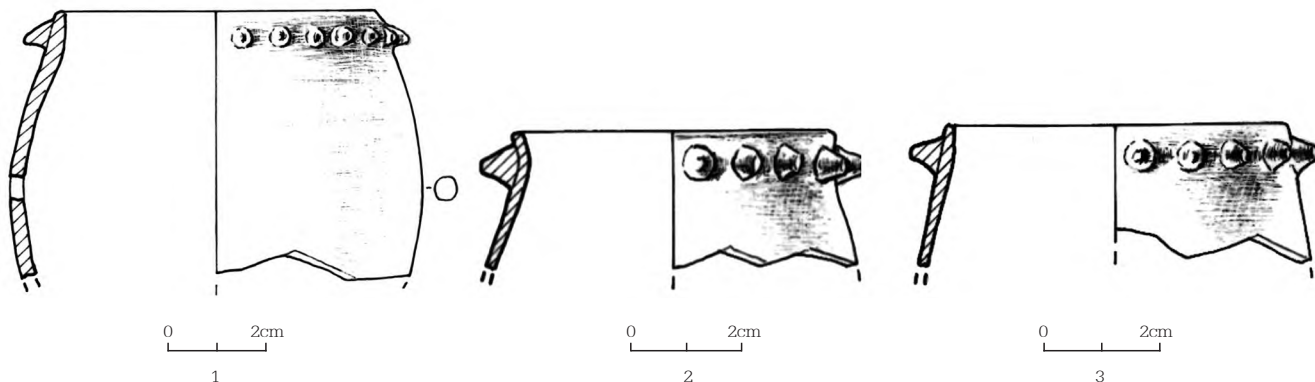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县康家遗址1987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第11—25页。

〔2〕 何德亮《山东史前乐器初探》,《中原文物》2003年第4期,第14—23页。

〔图三〕康家遗址新发现的陶鼓

1. 87KKT5H35 : 1 2. 85KKT1H6 : 12 3. 85KKT1H6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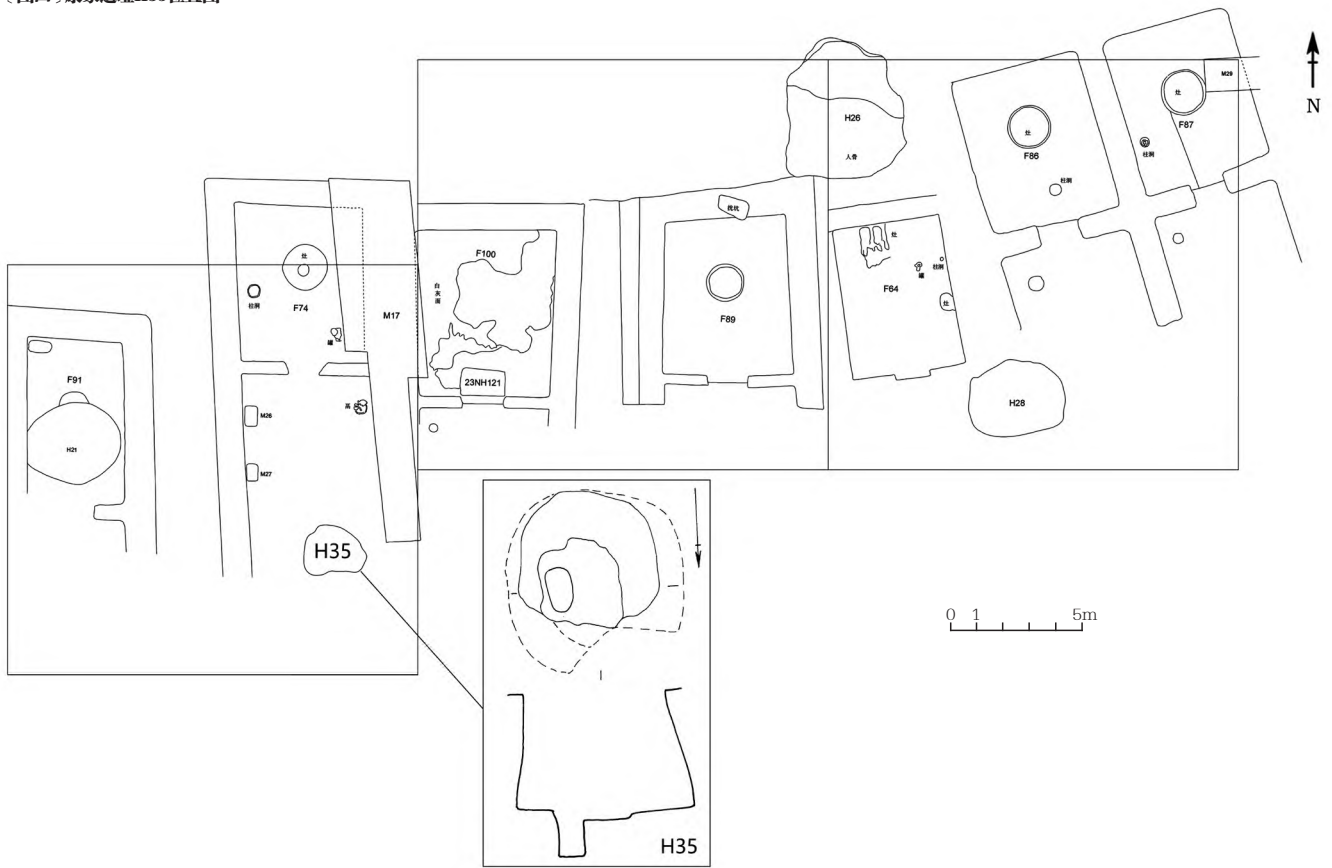
但是陶鼓本身为细泥质灰陶，表面磨光，制作精细，适合于小型聚会宴饮使用，可以单独拍打演奏。而既然是陶鼓，其鼓面是必须存在的，这是陶鼓与其他乐器不同的地方，若没有鼓面就无法敲击发声。那么，康家遗址发现的小型陶鼓其鼓面会用什么材质呢？康家遗址在历年4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共发现将近3万余片动物骨骼，分属于53种动物，其中羊骨占比为10%左右，水牛和黄牛合计占比大约为10%，其他为猪和鹿等动物^{〔1〕}。因此在康家村存续期间，羊皮和牛皮被用于鼓面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当然这只是推测，是否真的使用牛羊皮作鼓面，还需要通过对鼓钉部分的残留物进行分析来确证。

再来分析康家陶鼓出土的考古背景。出土陶鼓的H35是一个不太规整、未特意修整的灰坑，位于面积较大且排列规整排房前面的活动面上〔图四〕，显示出这座大面积房子与灰坑关系密切。特别是H35出土遗物，是在大量草木灰堆积中出土了超量的动物骨骼、蚌螺壳类及部分烧骨〔表一〕，并密集在灰坑的一侧出土，说明这种堆积不是一个长期使用、逐渐堆积的自然灰坑，有可能是某种宴饮礼仪类活动之后一次性投入的生活垃圾。H35的统计显示，除了十多件完整器外，加上残片口缘的出土陶器共20余件。与一般灰坑相比，陶器数量非常多。而位于I区的H6则是一个出土物非常丰富的规整的袋状灰坑，位于五连间排房南侧的门前活动面。出土的22件鹿角特别引人注目，也是康家遗址出土鹿角最多的遗迹单位。这表明H6附近可能存在集中处理鹿或鹿角的场所。坑内堆积以纯净灰土为主，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鱼刺、蚌壳和残陶片（约复原10余件），另有蚌刀、骨针、骨锥、石器、残玉器等小件器物，此外还出土了卜骨。

H6与H35内的包含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能都是如祭祀或者宴饮等特殊情况之后短期内形成的垃圾坑，与一般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坑有别。以上分析显示，陶鼓和共存遗物及灰坑的特殊性，均暗示着它们在康家聚落遗址中垃圾坑的属性。大量用于宴饮的肉食性动物骨骼、盛食陶器和占卜的卜骨及陶鼓，都是与祭祀礼仪紧密相关的元素。由此可以说，康家遗址出土的陶鼓是不曾流行陶鼓礼乐器的龙山文化

〔1〕 胡清波《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客省庄文化时期动物遗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

[图四] 康家遗址H35位置图



时期的一个特例，而其所体现的社会意义则需要在整个龙山文化所处时代背景下进行探讨。

[表一] 康家遗址H35出土动物数量统计

种类	件数	最小个体数	注
中华圆田螺	7	2	
圆顶珠蚌	6	4	
蚌	37		残片
环颈?	2	1	
中型鸟类	1	1	
草兔	3	1	
猪	17	2	
獐	3	2	
梅花鹿	30	1	
牛	4	1	
羊	7	1	
(合计)	117	16	

二 龙山文化时期出土陶鼓状况

至于其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鼓资料，目前公开发表的仅有几例。其一，山西吉县西村穆家嘴陶寺文化地层出土陶鼓1件(H23①：9)^{〔1〕}，直口方唇，鼓腹，口径约25厘米，底部孔径8.6厘米。口缘下有两排相错排列的犄角形鋤耳。器身附加有数周堆纹，下腹斜收，上有穿孔，底部为一小圆孔。陶鼓整体形态呈瓮形，其底部圆孔和器身拍打蓝纹或者绳纹的做法，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鼓略具有相似性，体现出继承了仰韶文化时期陶鼓的形态与风格。

其二，襄汾陶寺遗址大型墓葬出土的6件陶鼓，可分为矮颈与长颈两组：矮颈型的颈部较粗，比如M3072：11，器底凸起外撇，颈、腹之间置双耳，口沿下设11个圆饼状凸钮，钮径约4厘米，钮的上缘与筒壁近平，下缘呈刃状突起。颈部至耳下高约37厘米，器表抹光后又刻画有蛇躯鳞身状图案。腹底中孔稍残。通高80.4厘米，上口径25.6厘米，最大腹径41厘米。再比如M3016：33，呈灰褐色，口沿下设12个圆形柱状钮一周，腹下4个筒状孔的唇部及孔腔周壁均涂朱红色，无耳。通高45.6厘米，上口径18.66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底中孔径7.5厘米，底周三孔孔径3.4厘米。长颈形陶鼓，多为筒状高颈，小口，颈、腹之间置双耳。比如M3002：53，器底凸起外撇，口沿下附有12个向下弯曲的鼓钉，下腹部有三个管状小孔。腹壁饰绳纹间泥条构成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通高83.6厘米，口径11.6厘米。再比如M3032：1，口下有柱状圆钮两周各9个，上下两周钮的位置呈间隔分布。耳下至腹底在绳纹之上加多道泥条构成菱形格图案。通高140.5厘米^{〔2〕}，上口径11.4厘米，最大腹径39厘米，底中孔径9.2厘米，器底周孔径5厘米。陶寺陶鼓的形态尽管比仰韶文化流行的陶鼓个体大，制作精制，并有复杂的纹饰等礼仪性因素，但是从形态来看，其与穆家咀一样，对仰韶文化时期陶鼓有明显的继承性〔图五〕。

此外在甘肃临夏新集乡遗址和庄浪县小河村遗址各采集到一件陶鼓，发表者认为属于齐家文化时期，前者为泥质红陶，器形为中空漏斗形，由两个形状和大小不同的罐口与一条较长的中腔三个部分构成，大口呈喇叭状，下接较细的柱状腔体，小口为壶形，喇叭口外围有一周凸钮，共9个，鼓身与口沿同侧各有一耳。通高48厘米，底径38厘米。后者器身细长，高73厘米，筒径12厘米，口径15厘米，内径13厘米。素面无彩，通体施斜线纹，上端为宽边平口沿，略敞，口沿下围有一圈倒钩，共12个，底部残损。从发表的照片来看，显然与同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陶鼓比较相似，而与康家遗址出土陶鼓相异^{〔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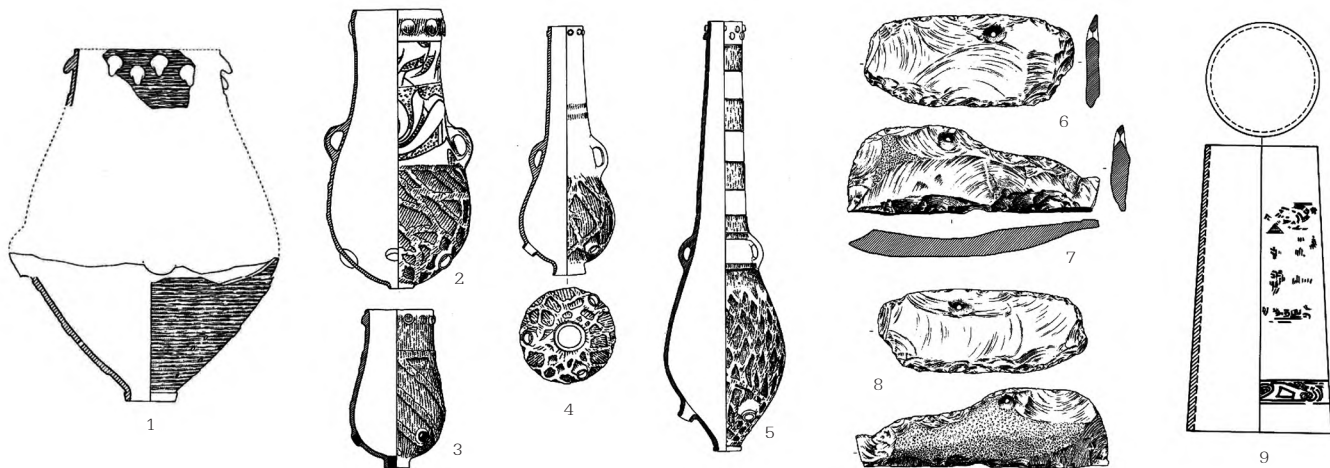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县西村穆家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86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襄汾陶寺 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638—672页。

〔3〕 王芸《陶鼓》（上、下），《乐器》2002年第10期，第82—83页。

〔图五〕山西吉县穆家村遗址与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鼓及共存礼乐器

1. 穆家咀遗址陶鼓 (H23①: 9) 2. 陶寺矮颈鼓 (M3072: 11) 3. 陶寺矮颈鼓 (M3016: 33)
4. 陶寺长颈鼓 (M3002: 53) 5. 陶寺长颈鼓 (M3032: 1) 6. 石磬 (M3015: 17)
7. 石磬 (M3002: 6) 8. 石磬 (M3016: 39) 9. 漆木鼓 (M3015: 15)



近期就在本论文将要投稿之际，新发现的陕西省蓝田县杨家沟客省庄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两件小型陶鼓H989③: 23和H416: 1，器形为直口罐形，口径大小与康家遗址陶鼓接近，口径外有较大的乳钉状凸钮交叉分布，而不像康家陶鼓那样为一列凸钮整齐排列。器壁较厚，黄褐色陶^①。尽管杨家沟陶鼓在器形上与康家陶鼓略有差异，但是大小几乎一致，暗示着客省庄文化时期可能流行小型陶鼓。可见康家遗址和杨家沟陶鼓形态和大小特征预示着从仰韶文化经历龙山文化早期，到了龙山文化晚期，陶鼓在形态和大小上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社会背景值得探讨。

三 龙山文化时期陶鼓的社会意义

根据学者研究，陶鼓作为一种礼乐器发端于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之后在仰韶文化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遗址中均有发现，除了辽河流域的陶鼓大多出土在祭祀性石圆圈遗迹周围，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外^②，其他地区的陶鼓主要出土于所在遗址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墓葬中。陶鼓作为墓葬随葬品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墓主人可能就是与这种礼乐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人物。因此仰韶文化时期，陶鼓作为一般祭祀活动的礼乐器，是以墓葬随葬为特点的，也是这一时期出土陶鼓的主要特征。

那么为什么到了礼乐制度更为重要和完善的龙山文化时期，作为礼乐器的陶鼓却不流行了呢？即使

① 承蒙发掘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郭小宁副研究员给予上手观察机会，本资料将在近期的《考古与文物》刊发。

② 陈星灿《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是陶鼓推考》，《北方文物》1990年第11期，第27页；陈星灿《中国史前乐器初论》，《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第31—38页。

在进入龙山文化晚期之前的庙底沟二期阶段也仅发现几处出土陶鼓的遗址，在数量上与仰韶文化时期相比少很多，显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陶鼓逐渐式微的衰落过程。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陶鼓的材质变化有关，比如陶寺遗址大墓中就与陶鼓一起出土了漆木鼓等，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否也与陶鼓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礼仪活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发生变化有关联呢？

陶寺作为龙山文化时期大型都城遗址，其陶鼓与漆木鼓共出于大型墓葬，与陶鼓共出的还有礼仪性质的特磬、鼗鼓或者陶铃和铜铃等，这在一般墓葬中少有发现。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时期虽然陶鼓盛行，但是陶鼓的真正礼仪化，并成为上层社会礼仪性象征物则是在龙山文化时期。目前除了陶寺遗址外，其他三例陶鼓是山西吉县西村穆家嘴遗址、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和蓝田杨家沟遗址。这三处遗址的规模性质以及陶鼓的出土背景都不具有都邑性质，也没有随葬在大型墓葬，而是在地层和灰坑这样的生活场所出土，与陶寺陶鼓的出土背景差异较大。因此有关陶鼓的使用以及社会意义的解释，需要从考古出土情景和当时社会组织结构这样大背景下进行重新思考。康家遗址所出土3件以上陶鼓，与陶寺遗址出土的6件陶鼓相比，不仅体形小，而且呈现为日常用器的罐形，与陶寺陶鼓那样是专门制作的大型陶鼓性质不同。如果说陶寺遗址出土的多件大型陶鼓应是专门用于大型礼仪祭祀活动中一组礼乐器中的一类，显示其为都邑性遗址中上层社会祭祀礼仪的载体的话，那么康家遗址的小型陶鼓就是当时社会组织中一般民众生活宴饮、庆丰喜乐的体现。因为陶寺遗址中与多件陶鼓共出的随葬乐器似乎存在着较为固定的配器方式，即单数或者双数的鼗鼓和特磬配一件陶鼓，或者是与石磬、漆木鼓、陶铃等一众乐器共同使用的，这种鼓的使用与小型的地域性聚落遗址陶鼓在功能与社会意义上应该有较大的差异，体现了陶鼓礼乐器的多重性质与使用场面的不同，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也有分别。

一些学者根据遗址大小及其他遗迹性质认为康家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层级结构中的第三级别——大型村落遗址，因为这个遗址除了成排成行的房址、灰坑和零散分布的灰坑葬、少量陶窑外，没有象征社会层级级别的建筑基址和丰富随葬品的墓葬。但是也承认存在频繁的宴饮祭祀性质的活动证据，比如在一些特殊灰坑内发现了卜骨、大量动物烧骨、大量陶器和非正常死亡的人骨等^{〔1〕}。陶鼓作为礼乐制度的物化体现，多在中心性遗址或者大型特殊遗址和墓葬才会出现，因为礼乐这种形而上的非日常用器似乎都是与社会统治者的礼仪活动相关联。本文认为陶鼓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习俗，在日常生活中的丰收庆典、婚丧嫁娶等百姓的祭祀宴饮活动中也是不能缺少的一种礼乐伴奏，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龙山文化时期作为礼乐器的陶鼓，不仅是祭祀礼仪中的制度化元素，可能也存在功能与使用规制上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至少存在都邑性遗址与地域聚落遗址的区别，既不仅仅是社会财富与阶层身份的象征物，也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礼乐制度的体现，可能还涵盖了一般民众社会文化习俗中宴饮活动对陶鼓的制作与使用。

〔1〕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9—64页。

陶鼓作为新石器时代祭祀礼仪的物化体现，从仰韶文化早期的一般性祭祀礼仪到龙山文化时期更为制度化的礼乐礼制体系的成熟，在“祀与礼”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逐步发展、变化并制度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习俗礼仪中社会上层和一般民众两个社会阶层对中华文明内涵的贡献，中国早期礼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早期社会各阶层不同形式产生的“礼”与“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石，而礼乐制度的建立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节点。《考工记图》云：“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陶鼓作为一种需要鼓面的打击乐，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被中华先民认识并创造出来作为乐器应用于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宴饮祭典活动，而康家遗址新发现的小型陶鼓则开启了夏王朝以来小型陶鼓融入礼仪制度的先河，最终成为中华传统礼仪文化中的重要因子之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 露)

The Jade Features of Ancient Shu State Analyzed from the Jades of Sanxingdui and Jinsha Sites

Fu Wanlu Xu Shiyu Ran Honglin Lei Yu Liu Ke Lu Hao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04 to 016.

ABSTRACT: The jades excavated at Sanxingdui and Jinsha sites mean much for unveiling the regional style and evolution sequence of the jades of ancient Shu State. The analysis between the jade objects from Pits 1 and 2 of Sanxingdui Site and those of Jinsha Site in material, craftsmanship, shape and ornamentation in the thesis tries to get the idea about the accumulated knowledge, techniques, values, religious sacrific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of the ancient Shu people in selecting, processing and using jade artifac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Jinsha jade grows up from Sanxingdui jade culturally in major features, meanwhile takes in multi-cultur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embodies the succession, innovation, consistency, inclusiveness and steadiness of the ancient Shu jade culture in development.

KEYWORDS: Sanxingdui site; Jinsha site; jade culture

On 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of Core Rod and Strip Chaplets to Sanxingdui Bronzes

Guo Jianbo Mei Jianjun Xiao Qing Zhang Xueyan
Chen Kunlong Xie Zhenbin Qu Liang Yu Jian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17 to 028.

ABSTRACT: The casting process of Sanxingdui bronzes is always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It is unique and distinctive in spite of its close link with the techniqu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The analysis using X-ray CT scanning and non-destructive testing has gained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Sanxingdui bronz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of core rod and strip chaplet. It works as the advanced casting process of that time to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chnology between the bronze products of Sanxingdui and anywhere else of the same age, reflecting the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where the Sanxingdui bronzes come into being.

KEYWORDS: Sanxingdui site; bronze artifact; core rod; strip chaplet

A Research on Pottery Drums Unearthed at Kangjia Site in Lintong, Shaanxi

Qin Xiaoli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29 to 037.

ABSTRACT: Neolithic pottery drums are commonly found in the sites under the Yangshao Culture, but rarely under the Longshan Culture when the ritual system is relatively well-

develope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a couple of the documented pottery drums and shards excavated at Kangjia site of Lintong of Shaanxi Province, which are dated to the late period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They are likely drum-shaped wares used in daily life more than ceremonial drums. jar-shaped, smaller than the large-sized alligator-shaped drums of the tombs in Taosi. Meanwhile, the analysis also touched on the pottery drums in social sense and the roles they play in the traditional ritual culture under the Longshan Culture of China.

KEYWORDS: Keshengzhuang Culture; Kangjia Site; pottery drum; etiquette culture; sacrificial banquet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onto Dongzhang Kilns in Fuqing

Chen Zhitao Yang Zelin

ABSTRACT: ‘Dongzhang Kiln’ is collectively named for the kiln sites respectively located in the villages of Shikeng, Banling, Lingxia and Zhongshan altogether in Dongzhang Town, Fuqing City, Fujian Province. Along with the Dou Cha (tea appreciation, tea competition) culture rising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black-glazed *Zhan* (small cup) prevailed and served as a representative symbol of tea set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Dongzhang Kiln did the same as Jian Kiln to fire a large amount of black-glazed *Zhan*, which made itself top-listed among the manufacturers along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in the Song-Yuan period. The report based on the 2022-2023 investigation of Dongzhang Kiln sites reviews the porcelain products in type and 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Dongzhang Kiln or Dongzhang Ware with the remains in the sites and the 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38 to 062.

KEYWORDS: Dongzhang Kiln; Song-Yuan period; black-glazed porcelain; export porcelain

